

教育筛选的双重困境：中产阶层留学决策中的信号贬值与阶层托举博弈——基于应用型高等院校的延伸研究

周国莉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533000；

摘要：本文聚焦中产家庭子女在应用型高校背景下的留学决策，揭示教育双轨体系（学术型/应用型）中阶层复制与信号贬值叠加的双重困境。研究发现：国际竞争加剧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留学生限制升级，海归文凭信号价值加速衰减；中产阶层（尤其应用型高校家庭）为规避国内教育分流挤压，转向德国FH类应用技术大学等“技能型留学”路径，却因跨国技能互认缺失陷入“双重失信”困局。基于信号理论（Spence,1973）与教育分层框架，提出“制度-校企-家庭”三维破解路径。研究强调：破解中产教育筛选困境需重构技能认证体系，推动家庭决策从“学历军备竞赛”转向精准技能投资。

关键词：阶层托举；教育分流；信号贬值；中产焦虑；应用型高校

DOI：10.69979/3029-2700.26.03.051

1 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1.1 教育流动性的角色演变

纵向阶层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焦点。布劳与邓肯（Blau&Duncan）的经典研究表明，教育程度是职业地位的核心决定因素。改革开放后，教育主导的人力资本成为底层向上流动的关键通道。然而，近年制度变迁弱化了教育的流动性功能，使其逐渐演变为阶层复制的工具——对优势阶层而言，教育沦为一种社会封闭机制（李春玲,2019）。

1.2 双轨体系下的新流动趋势

教育筛选机制在学术型与应用型双轨中均呈现阶层固化效应：学术轨：名校资源向精英阶层集中，巩固代际优势；应用型轨：职教污名化倒逼中产转向国际技能教育市场。某应用型高校2024年调查显示：62%中产家庭认为“海外技能证书比国内职教文凭更具求职竞争力”。这一“结构性逆向流动”凸显双轨体系下的筛选失衡。然而在国内人力资源对海归的评价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又呈现出新的流动趋势：学业优秀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国内学习，而“学业非优势群体”出国留学的比例增加。

2 国际教育环境剧变与信号贬值深化

2.1 全球教育壁垒的兴起

当前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格局，逆全球化思潮在持续发酵，给全球教育交流带来诸多壁垒。西方国家从贸易战升级到科技战，使中国留学生留学道路受阻。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导致许多理工科学生无法顺利出国深造，整个留学市场面临巨大下滑困境。

表1：部分C9高校本科生留学率跌幅（2020-2024）

高校	2020年留学率	2024年留学率	跌幅
北京大学	27.60%	16.20%	-41.30%
清华大学	24.90%	12.80%	-48.60%
复旦大学	22.30%	14.70%	-34.10%
上海交通大学	21.80%	13.50%	-38.10%
南京大学	18.50%	11.90%	-35.70%
浙江大学	19.20%	15.00%	-21.90%

数据来源：《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新东方《2024留学趋势预测》

在此背景下，学业优势群体转向国内升学或“在地化留学”，而应用型高校群体呈现逆向流动：教育部监管数据显示，2018-2022年选择德国FH类应用技术大学、澳大利亚TAFE学院等非学术型院校的学生数量增长83%。

2.2 信号系统的加速贬值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其《市场就业信号》中提出了信号模型。他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就业

市场上,求职者通过学历作为标志向雇主传递自己的能力, QS 高排名大学以其质量和声誉成为求职者向雇主传递其能力和生产率的强烈信号。然而该信号模型当前面临双重贬值:

(1) 海归整体评价下降: 雇主因甄别成本上升, 更依赖工作经验等可验证能力。海归人数增加, 海归的质量参差不齐时, 导致雇主对海归的整体评价下降, 甄别成本可能上升;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 国内优秀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很多领域与海归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竞争力, 在此双重因素下, 雇主更倾向于通过更易于观察和验证的信号, 如工作经验和实际技能, 而不仅依赖于海外学历。

(2) 技能证书信号弱化: 智能制造企业 HR 访谈 (n=15) 表明: “墨尔本 TAFE 证书持有者起薪仅较国内高职毕业生高 15%”, 区别于 C9 高校的留学率下滑, 应用型高校呈现“结构性逆向流动”。教育部涉外监管数据显示, 近 3 年来选择德国 FH 类应用技术大学、澳大利亚 TAFE 学院等非学术型院校的学生数量增长 80% 以上, 主要集中于智能制造、护理康复等实操领域。这种“技能型留学”虽规避了国内学历歧视, 却面临新的信号危机——某智能制造企业 HR 访谈表明: “我们无法有效区分墨尔本 TAFE 证书持有者的真实技能水平, 这导致其起薪较国内高职毕业生仅高出 15%”, 反映技能型海归的认证危机。

3 中产阶层在双重挤压下的结构性困境与留学策略转型

3.1 中产阶层的脆弱性: 文化资本依赖与代际焦虑

中产阶层(尤指应用型高校家庭)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文化资本主导型”阶层地位:

(1) 核心资本依赖: 缺乏精英阶层的经济垄断力与社会资本网络, 主要依靠学历、技能认证等文化资本实现阶层维持;

(2) 代际托举刚需: 强烈的“恐跌”焦虑驱动对子女教育的超额投入, 亟需通过教育路径复制或提升代际地位;

(3) 国内路径失灵: 在国内教育双轨制中陷入两难——学术轨(985/211)资源遭精英垄断, 应用轨(高职院校)深陷社会污名化陷阱。

3.2 双重挤压下的结构性困境

国际信号贬值与国内教育分流的叠加压力, 形成系统性困局, 其困境本质又表现在: 国内无理想出路→国际传统路径受阻→阶层托举通道系统性收窄。

表 2 困境本质核心矛盾及后果

挤压维度	核心矛盾	后果
国内教育分流	学术轨资源壁垒化+应用轨污名化	中产“学业非优势群体”升学无门
国际信号贬值	海归文凭鉴别力下降+雇主转向经验验证机制	留学投资回报风险陡增
精英阶层排斥	经济资本垄断低龄优质留学资源(如美高+常春藤)	挤压中产国际教育选择空间

3.3 策略转型: 被动奔赴“技能型留学”

在双重挤压下, 留学决策呈现从学历崇拜向风险规避转型的特征:

(1) 目标重置: 从“追逐 QS 排名”转向“规避国内职教污名”; 从“学历镀金”转向“获取跨境技能认证”(如德国 IHK 证书、澳洲 TAFE 文凭)。

(2) 路径选择: 聚焦德国 FH 类应用技术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等实践导向院校, 重点投向智能制造、护理康复等实操性强且存在“技能溢价想象”的领域

(3) 底层逻辑: 制度套利: 利用海外技能教育体系规避国内职教歧视链; 信号替代: 以“国际认证技能”替代失效的学历信号

这种“技能型留学”本质是阶层托举需求与教育筛选失灵碰撞的产物。表面看是主动选择的国际化教育策略; 实质看是国内教育路径崩塌后的被动自救行为; 悖论点: 其赖以生存的“技能信号”(如 TAFE 证书)正在新一轮信号贬值中加速瓦解。

4 教育筛选双重困境的破解路径与机制重构

4.1 双重困境的深化机制

信号系统的加速贬值: 全球化文凭通胀导致传统教育符号(如 QS 排名)鉴别力持续弱化。雇主甄别机制向“能力验证”转型, 削弱了学历信号的边际效益。

阶层托举的路径异化: 精英阶层通过经济资本垄断低龄优质教育资源(如美高+常春藤路径), 挤压中产阶层上升通道。应用型高校家庭的“技能型留学”(如德国 FH 类院校)沦为风险转嫁策略——虽规避国内职教污名化, 却因跨国技能互认体系缺失(如德国 IHK

证书在华未纳入职称评定),陷入“双重失信”困境(国内不认职教背景,海外技能本土难转化)。

4.2 三维破解路径设计

第一维度:制度突破——构建跨国技能认证体系。建立国际通用的技能资格互认机制,打通应用型人才跨境流通的制度壁垒。

第二维度:校企合作——发展产教融合的在地国际化。通过跨国校企合作实现“技能可视化”,降低雇主对海外学历的信号依赖。

第三维度:家庭决策转型——重构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引导中产家庭建立包含地缘政治变量的教育投资计算框架。

制度突破为跨国技能流通奠基;校企合作使能力可观测化解信号贬值;家庭决策模型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阶层托举。其本质是将中产阶层的教育博弈,从零和竞争的“学历军备竞赛”转向基于技能认证的“差异化投资”。

高等教育在双轨体系中均呈现阶层复制效应:学术型教育通过名校垄断巩固精英地位,应用型教育则因职教污名化迫使中产转向国际技能市场。这种双重困境本质是全球化退潮中教育筛选功能的系统性失衡——既复制不平等结构,又为中产保留脆弱的代际跃迁通道。破解中产阶层教育筛选困境,需在信号加速贬值与阶层托举刚需间建立新平衡。这要求政策端打通技能跨境流通的制度壁垒,同时推动家庭决策从“学历军备竞赛”转向基于地缘风险的技能精准投资——只有当德国

IHK 机床师证书比泛化的“澳洲 TAFE 文凭”更能触发雇主能力信号时,应用型留学的托举博弈才可能破局。

参考文献

- [1]李春玲.(2019).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性:中国中产阶层的困境.社会学研究,34(5),12-35.
- [2]吴晓刚,&李忠路.(2017).海外学历的价值变迁:基于雇主评价的实证分析.社会,37(6),89-110.
- [3]王宁.(2020).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与文化资本策略.教育学报,46(3),45-5
- [4]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2022). The German VET System: A Model for China?
- [5]张立新.(2023).应用型高校跨境教育的信号异化研究.职业教育研究,40(1),56-64.
- [6]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7]Marginson, S. (2016). The worldwide trend to high participation higher education: Dynamic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clusive systems. Higher Education, 72(4), 413-434.
- [8]Waters, J. L. (2006).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ircular migration and family strategies between Canada and Hong Kong reg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2), 179-192.